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译 丛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RADICAL
DEMOCRACY

激进民主

[美]道格拉斯·拉米斯 (C. Douglas Lummis) ©著

刘元琪©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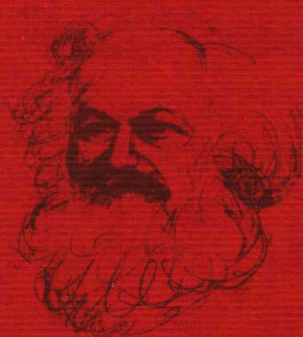


RADICAL DEMOCRACY

激进民主

[美]道格拉斯·拉米斯 (C. Douglas Lummis) 著

刘元琪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激进民主/[美] 拉米斯著; 刘元琪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300-09139-6

- I. 激…
- II. ①拉…②刘…
- III. ①民主-研究
- IV.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8896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激进民主

[美] 道格拉斯·拉米斯 (C. Douglas Lummis) 著

刘元琪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0.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1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编委会

顾问 徐崇温 李景源 叶汝贤 陈学明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编 郑一明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治河 刘元琪 李惠斌 杨金海 余文烈

陈振明 陆俊 欧阳英 曹荣湘 鲁克俭



总 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

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① [美] 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为《激进民主》中文版写序。我也很想知道今天中国的读者如何看待这本书。当我写作时，我心中最初设定的对象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读者。很自然，这本书是以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为背景的。更确切地说，它是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著作，即是说，它既被 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主义也被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所产生的幻灭感所影响。

激进民主力图表达的是一个特殊的美国问题（称呼它是一个“美国问题”，我并不是意指它不是别的地方的问题，因为美国有办法将它的问题强加给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美国人，不仅一般的民众而且社会科学家对于民主真实意义的理解很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民主的本义是指人民拥有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力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它却逐渐被重新定义为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发展出来帮助人民赢得和拥有这种权力。由于很多这样的制度（宪政、由法律确立的人权和定期选举等）在美国已经建立起来，美国人就易于将“民主”等同于他们自己那一套政治制度。于是，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还是反抗国家权力的人们之理想的民主就演化成为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美国人被教导成持这样一种观点——民主行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投票选举这个或那个政党来轮流统治这一超级大国（或被这一超级大国统治），并支持这个超级大国在国外的“保护民主的战争”。

第二，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被这样教育——平等的民主理念只能适用于政治领域，不适用于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自由就是自由

市场，以至于任何通过把资本置于政治控制之下的方式来矫正自由市场所产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做法都被看作是非民主的甚至是独裁的。在这种世界观的笼罩下，人们很难理解到经济体系本身也能成为一个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人们比如工人被一种非民主的方式所统治。

这本书（像我在第一章中所写）呼吁“正名”。我从孔夫子那里借来这一术语，虽然孔夫子的原意与此大为不同。这本书呼吁回归到民主的原意——人民的权力上去。我们应将这个词从那些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手中夺回，将它归还给人民。我认为，不应该将民主看作一个已经建立的制度性的权力体系，而是应看作“一项还有待实现的承诺”。这一承诺特别在经济领域还没有实现。工厂民主化的问题，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工人们都努力斗争以求解决，但是在21世纪它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难问题。

为实现正名，本书往西方特别是英美历史深处挖掘，以唤起人们，使他们认识到：民主在历史上曾经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一个理想。它指出，定义为人民权力的民主不是一个新的思想，而是恢复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当然，所有这些论述本来是面向西方的。我能肯定中国读者将在这本书中发现很多不适用于他们状况的内容。提出要注意这本书的西方背景可能不利于说服那些生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的人们。如果对中国历史有丰富的理解的某位能够为中国读者写作一本和本书意图类似的著作，它肯定和这本书不一样。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书可以写出来，也许已经有这样的书了。也就是说，如果承认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权力，而不是取得权力的任何一种特定的制度，那么这种理念的根本精神肯定能够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找到。就像没有任何有机体自己去寻求疾病一样，没有任何民族会去寻求衰弱、压迫、剥削和堕落。如果这是我的一种倾向，那么就让它吧：这正是我的信仰。同时，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马克思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肯定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传统已经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这本书主张马克思的解放哲学的伦理基础是民主（像马克思年轻时候所公开表达的一样）。资本主义发展的缺陷是，它剥削和压迫工人并产生不平等，也就是说，它是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它结束剥削和压迫并给工人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力，也就是说，它将使经济领域民主化。因此，社会主义是手段，而民主是目的。如果承认社会主义是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只是通向目的的一种设计。如果它不能带来所期望的目的，这绝对不会使民主本身失去可信度。它只是意味着必须寻求别的方式。

如果这种主张被接受，那么也许将有助于中国读者认识到，民主不是美国政府利用禁运等压力方式从外部强加给中国的“美国体系”，而是中国人民

在过去 100 年和更长的时间中历经巨大的、痛苦的和英勇的斗争而力求达到的重要价值。

本书认为，马克思从未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发展道路”。正是列宁在掌握政权后，在发现苏维埃国家的工业革命还是一片空白时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这种转换（我认为这种转换是很根本的）。我希望即使那些不同意我这种解释的读者也能够发现，我这样做是在力图回到马克思的伦理观的根本上去。而且，这本书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很清楚地把握到“压迫的意志”和“剥削的意志”在何种程度上已经被物化进机器和生产结构之中。这便利了恩格斯、列宁和以后的理论家这样主张：工厂中自由的缺乏不可避免，工人对它的反抗是错误的。我相信，对机器的神秘化对全世界工人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工业机器并不简单是既可以用于好的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的中性工具。机器已经嵌入了深刻影响操作机器的工人的伦理选择（例如效率）。这意味着，工人民主化这一历史任务（工人的解放）必须包括“机器”的“去神秘化”和“去物化”。如果关于机器的这种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它也适用于作为今天中国工业化基础的机器。因此中国读者可能发现这本书的有些内容和他们今天的情境还是有关系的。

最后我要感谢翻译和编辑《激进民主》中文版的朋友，特别要感谢刘元琪，他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

道格拉斯·拉米斯

2002 年 7 月 24 日

致 谢



这本书第一稿的大部分写于1987—1988年我离开津田塾大学度年假期间。我作为一名访问学者在菲律宾大学的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度过了半年时间。我感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以及当时的主任伦道夫·S·大卫(Randolf S. David)，他不仅给我提供了访问学者的资格，而且给我提供了最难得的优待——在图书馆可以有一张桌子。在那段时间中，我不仅和伦道夫·S·大卫，还和该中心副主任辛西娅·鲍蒂斯塔(Cynthia Bautista)，以及P.B. 阿宾内尔斯(P.B. Abinales)、亚历山大·马格罗(Alexander Magno)，还有该中心别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我还有很好的机会能和萨尔瓦多·卡洛斯(Salvador Carlos)一起教一门政治理论课程，并在和他的对话中受益良多。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也发起了三次讲演，在这过程中我拿出了本书前三章的第一稿，而且我收到了对这些讲演稿的生动的、有思想的批评。我特别要感谢雷诺多·拉卡萨(Reynoldo Racasa)，他不但租给我们一个房间，而且从他的餐桌上我得到了丰富而生动的有关菲律宾政治和社会的知识。

1988年下半年，我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变迁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对于这一决定我感谢该研究所及其主任特洛伊·达斯特(Troy Duster)。该研究所发起了一次讲演，在那次讲演上，我得以拿出第二章的第二稿。在那段时间中，R·杰弗里·勒斯蒂格(R. Jeffrey Lustig)让我们住在他在伯克利后院的小屋中，他阅读我的稿子，提出富有帮助的批评。多谢杰弗里！

下一个我必须提到的团体要指明明白有一点困难，因为它没有名字。这是一个界定相当模糊的研究团体，其成员只是不定时地碰面，最初是由伊

凡·伊里奇 (Ivan Illich) 组织的。在 1988 年和 1989 年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在 1990 年于得克萨斯的豪斯顿, 我分别有幸加入这个团体。这些会议的结果是《发展词典: 作为权力的知识的指南》(*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ed. Wolfgang Sachs, London: Zed Books, 1992)。我给那本书撰写的部分(“平等”, 38~52 页)和本书第二章相当部分是重合的, 我非常受益于那些会议上的对话。我要特别感谢的不仅仅有伊里奇和萨克斯 (Sachs), 而且有哈里·克利弗 (Harry Cleaver)、巴巴拉·杜登 (Barbara Duden)、古斯塔沃·埃斯蒂法 (Gustavo Esteva)、阿什斯·南蒂 (Ashis Nandy)、马奇德·拉赫利玛 (Majid Rahnema)、琼·罗伯特 (Jean Robert) 和特奥多·沙宁 (Teodor Shanin)。

影响这本书的另一实际经历是我参加了对 1989 年夏季在日本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规划, 这些会议称为“为 21 世纪的人民计划”, 特别是参与了一年之久的讨论——这些讨论后来形成《水俣宣言》。我特别要感谢我在亚太资源中心的同事武藤一羊 (Muto Ichiyo), 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受民族国家限制的民主或解放理论, 至少在历史上的此时是一个贫乏的理论。

而且, 在津田塾大学和我的同事三浦永光 (Miura Nagamitsu) 共同教一门课程的过程中, 我获得了很多启发——我们共同设计的这个课程是关于进步理论的批判历史的。

下述一些人细致地阅读手稿并提出有见地的批评: 除了勒斯蒂格之外, 还有弗兰克·巴达克 (Frank Bardacke)、汉娜·皮特金 (Hanna Pitkin)、约翰·沙尔 (John Schaar) 和马克·塞尔登 (Mark Selden)。从这些人那里获得的鼓励可以说是我的精神食粮。我要特别感谢杰弗里·伊萨卡 (Jeffrey Isaac)——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编外审读员, 他提出了有帮助的、建设性的建议。我在“导言”中也表示了对马洛·肯瑞 (Muro Kenji)、鹤见俊介 (Tsukurumi Shunsuke) 和谢尔顿·沃林 (Sheldon Wolin) 的感谢。

我衷心地感谢藤原淳子 (Narahara Junko) 和山香淳子 (Yamaga Junko) 的内行的打字。

我感谢我的父亲——基思·拉米斯 (Keith Lummis), 他给了我很多, 其中有几句话可以作为本书的题词:

“你不必精明, 你所有要做的是停下来, 思考。”

通常, 一个男作家致谢最坏的时刻在最后到来——当他感谢有耐心的妻子时。这里, 我感谢我的妻子——斋藤靖子 (Saito Yasuko), 不是为了其耐心而是为了她没有耐心。她以这样一种方式帮助我继续我的计划: 她偶然问: “什么? 你还在忙那件事情?”

你也许会想：有这些帮助，这本书将比原来的手稿好得多。如果事实与此不符，读者知道该责怪谁。

这本书的萌芽是我的文章《民主的激进主义》，发表在《民主》杂志第2卷第4期（1982年秋季号）。这篇文章也以日文发表于《日本的激进宪法》（Tokyo: Shobunsha, 1987）一书中。第二章最初以《反对民主的发展》的题目发表在《替代：社会转化和人的治理》第16卷第1期（1991年冬季号）。第五章曾被收入为庆贺伊凡·伊里奇的60岁生日而编的《朋友书，纪念册》一书中。我感谢这些出版物的编辑允许我用这些材料。

道格拉斯·拉米斯

目 录



导言 激进民主	1
第一章 激进民主	6
第二章 反民主的发展	36
第三章 反民主的机器	69
第四章 民主有缺陷的传统	99
第五章 民主美德	128
结论：普西芬尼回归	143
译后记	148

导言

激进民主



在 1980 年的某个时候，我的朋友马洛·肯瑞（Muro Kenji）在和他的指导教师兼朋友——一位名为鹤见俊介（Tsurumi Shunsuke）的哲学家谈过话后，顺访了我，他兴致很高（这是他的习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他说，“民主在所有地方都是激进的。它在任何一个体系、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批判性的：在美国，在苏联，在日本，在菲律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所有地方”。这个既老又新、既简单又复杂、既显而易见又模糊不清的观念，是有吸引力的。当看到有一个人对这样一个原则——据 E. M. 福斯特（E. M. Forster）讲，这个原则只值得欢呼两下，但绝不值得欢呼三下——如此兴致勃勃，我是感到很好奇的。

大约在相同的时候，有人从美国寄来一封信说，有一本名为《民主》的杂志，并询问我在日本是否有激进民主主义者可以举荐为这本杂志撰稿。^[1]“激进民主”这个观念开始植入我的脑海。这种经验有点像你开始爱上邻家的一位姑娘（或小伙），那种感觉你一直知道但突然变得那样新鲜、那样鲜明、那样……无有前例。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美国以及在日本，我一直是某种类型的运动积极分子，但像很多人一样，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道槛，我未跨过，只是一直借重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的批判力量。在那些年代的运动政治学中，马克思主义被解释为和民主左翼有一定的距离，即是说比民主左翼要激进；在另一方面，民主主义者被解释为站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地位上（并很难和后者区分开）。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左—中—右这样的空间性的隐喻对于安置我们政治学的方式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量。一个人的政治定位如果是被认为在另外的两种政治倾向之间，这种定位很难避免被想象为是一种妥协、杂糅，并且没有自己独立清晰的原则。我开始感觉到鹤见-马洛的定律（“民主在所有地方都是批判性的”）能够成为重新安排这个空间性的形象的基础。民主既然像激进主义一样被认为是激进的，所有其他的政治定位和这些政治定位之间的关

系将呈现一种新的面貌。这将导致对政治现实作出更精确的反思，以及以一种方式赋予民主理论更强的批判力量。^[2]

从我最初为这本书的观点开始构思算起，十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在诸如波兰、缅甸、菲律宾等不同的国家中发生了激烈的民主运动，同时在民主理论领域产生了新的一波作为。在很多年中，任何一本题为《民主》的书，基本可以判断为是在单调重复北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所谓优点，但是称民主为激进的一批理论家也出现了。^[3]当乔治·布什宣称在他的任期内民主已经“胜利了”的时候，另外有人正建构或重新发现一种民主观念，这种民主观念不仅可以作为对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而且可以作为对里根和布什与其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共有的意识形态框架进行批判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民主的讨论第一次让人感兴趣。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贡献给这一讨论的。

很有趣的是，当我在菲律宾大学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工作时，我不仅很难向在日本和美国的朋友，也很难向在菲律宾的朋友解释我的研究选择。我到菲律宾不是研究菲律宾本身，而是进行研究民主理论的准备工作，这在他们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在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偏见在作怪。如果一位在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不研究马萨诸塞的政治或文化，人们不觉得奇怪。一位在康奈尔大学的访问学者去研究东南亚或一位在伦敦大学的访问学者去研究非洲，人们也不觉得奇怪。但反过来就不是如此：一位前往第三世界的访问学者就被认定要去研究第三世界。

我有意地选择菲律宾大学以打破这种固定观念，这符合这种一般原则：如果你打破某个固定的观念，你很可能将学到意想不到的事物。但是我选择菲律宾无论如何也不是偶然的。当时，1986年2月的人民权力革命刚过去一年。“人民权力”是希腊单词 *demos* 和 *kratia* 的英译。人民权力——激进民主做了表面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不仅通过人民赢得选举，而且通过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监督这场选举而获得选举胜利，人民将一个腐败的、有精良武装保护的、卑鄙而富裕的独裁者赶下台并赶出国。我想去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民主不只是一个无力的口号而且是一个活的概念，一个真正重要的、人民以热情和投入来谈论的原则。事物并没有完全那样发展。尽管在马科斯政权的最后几年，公众情绪充满兴奋和激进希望，到1987年春天，公众情绪陷入了幻灭。激进希望——这是人民运动的核心（我在第五章将更多地谈论这一点），已经制造了一种准确地说是革命的政治情境，但是这一希望的目标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政客——正寻求赢得选举的科拉松·阿基诺。激进民主在重建自由主义政治中消耗了自己的能量。土地改革搁浅了，内战在继续，1987年是阴

郁的一年。

尽管希望幻灭了，内容丰富的和警策性的关于民主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只是转向这样的问题：已经出了什么错或正在出什么错？马克思主义者很吃惊的是民主完成了那么多的事情，而左翼自由主义者做的事却那么少。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以前所持的关于民主的观念现在表明是有些问题的。因此这是一段虽然不令人高兴但是令人振奋的时光。

而且，我原来学到意想不到的东西的期望没有落空。在和菲律宾知识分子讨论民主理论以及读他们关于民主的著作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撞上同一堵砖墙，即“发展”这堵墙。从北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视角看清民主和发展之间的冲突比从第三世界的视角看清这一冲突要更困难。事实上，北方工业发达国家关于民主的著作几乎不触及第三世界：关于第三世界的书归于“区域研究”或“发展经济学”的名目之下，这是和政治理论很不同的领域。但是，如果民主在世界上至关重要，那么它在第三世界也至关重要，那里某种形式的伟大民主斗争已经并正在展开。在菲律宾，我意识到，任何一个人如果要谈论第三世界的民主（或者说谈论一个有第三世界的世界民主），将必须处理发展这一问题以及发展之反民主倾向。这是本书第二章的主题。

这本书没有把任何制度作为推荐目标。当我提到某一制度时，我仅仅是说明一个原则，而不是做一种具体选择。^[4]我并不是认为具体选择不重要，相反，它恰恰是政治探讨的内容，但是，这里我所探讨的民主的本质是人类事物的原则，它不是种种的制度或行为——通过这种种制度和行为，人们在实践中实现民主这一原则。所有这些都经常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当我们说起时，好像民主就是自由选举，或是法律保障人权，或是工人参与。可是，举例说，我们并不说和平是和平条约，或公正是法院审判。和平条约可能带来和平或法院审判可能带来公正，这仅仅是假设。我们从经验可知，这样的假设有时能被事实证验，有时却完全不能。我们能判断这些假设是否具有相对的正确性或成功，是因为我们有独立于审判和条约的公正与和平观念。同样地（像我们下面所要主张的）“选举”、“法律保障”或“工人参与”也是假设。要判断它们的价值，我们要尽可能地明了人类关系中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制度成立。显然，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在民主讨论的这一方面作出贡献。

换一个方式说，这本书并不是要写成本关于乌托邦理论的著作。我没有任何以前人们没有想象过的计划安排。相反，很多美好的民主计划已经摆在桌面上，而且摆在桌面上已经多年甚至几个世纪了。事实上，在任何大陆、在任何国家、在任何类型的体制中，都有民主运动。但任何一次这样的运动都面对着不同的情境，因此需要一个不同的出路。将金钱左右的北方国